



中国革命史讲义

〔初稿〕

第三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革命史講義

[初稿]

第三編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編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1956年 北京

局瓦密堡會議和毛澤東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爲黨再度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

中國革命史講義〔初稿〕

第三編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編等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蘇州西大街橋胡同28號)

*

1955年4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3次印刷

35—29(Ⅱ) • 850×1168 1/32 • 5 7/8 印張 • 119,000字

2617—5825(3200+9)冊

定價(6)0.60元

目次

第三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六章 中國革命的低潮。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爲創造紅色政權而鬥爭……………一——六三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二年九月)

第一節 中國革命的低潮……………一

第二節 『八一』南昌起義和農民游擊戰爭的發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立……………一三

第三節 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毛澤東關於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理論……………二八

第四節 黨內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出現及其被克服。三次反圍攻戰爭的勝利……………四八

結語……………六二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侵略和粉碎蔣介石匪幫對紅色區域的圍攻而鬥爭……………六四——一〇八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第一節 日本帝國主義的強佔東北。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六四

第二節 全國革命高潮暫時低落期間的紅色區域的鬥爭和抗日鬥爭……………八二

第三節 紅軍的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召開……………九七

結語……………一〇七

第八章 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漲和中國共產黨

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一〇九——一二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節 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漲。毛澤東所著……………一〇九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的發表……………一〇九

第二節 西安事變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初步形成……………一三五

第三節 東北人民抗日聯軍的鬥爭……………一四七

第四節 毛澤東所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一六〇

結語……………一八一

第六章 中國革命的低潮。中國共產黨領導

人民爲創造紅色政權而鬥爭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二年九月)

第一節 中國革命的低潮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國際環境〕 在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時期中，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量和貿易額，到一九二七年已超過或接近戰前水準。但是這個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則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更大地超過了戰前水準。美亞兩洲在世界商品流轉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加，而歐洲所佔的比重則降落了下去。經濟中心從歐洲移到了美洲，從大西洋移到了太平洋。一些國家生產能力的迅速增長與世界市場範圍的相對穩定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資本主義各國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日益尖銳，顯明了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局面的極不穩固，資本主義新危機的必將到來，和

資本主義各國間新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過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而確立起來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分配情形。首先是美國不滿意，因為它不願以南美洲爲滿足而力圖侵入亞洲（首先是中國）；英國也不滿意，因為它喪失了自治領以及東方許多極重要的市場；日本也不滿意，因為美英兩國在中國時常『妨礙』它的行動；法國和意大利也不滿意，因為它們在多瑙河沿岸諸國和地中海一帶有許多『爭執點』；德國尤其不滿意，因為它這時還沒有殖民地。於是，各國都力求重新分割市場和原料產地，而亞洲市場和通往亞洲去的道路（地中海、近東）便成了主要的角鬥場所。亞洲的最大國家——中國，則一直是美、日、英三國相互間激烈爭奪的焦點。同時，爲了確保中國這塊掠奪市場，各帝國主義以美國爲首，又拚命支持蔣介石反革命政府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戰爭。

同時，資本主義生產可能性的巨大增長（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和千百萬勞動羣衆的購買能力相對地縮小（資本家時時竭力要把他們的生活水平束縛在極低限度的範圍之內）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劇，顯示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很快就要到來。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到一九三〇年第一季，根據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統計，英國和德國在這三年中工業生產陷於停滯狀況，美國經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漲後，在一九三〇年第一

季生產水平又降低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法國在這三年中大工業生產雖然有稍許的高漲，但它的高漲纔是一年年下降的。到一九二九年末，終於在世界範圍內爆發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也逐漸法西斯化。法西斯政府首先在意大利、波蘭和日本建立起來，統治英、法、德的也是反動的右翼黨派聯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和平』幌子的掩蓋下拚命進行擴充軍備，拚命鎮壓國內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和資本主義世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蘇聯到一九二七年末，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已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在世界一切國家中，只有蘇聯的大工業一直是蓬勃地高漲着，這一高漲纔是一年年地上升的。到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度，生產水平就超過了一九二七年水平的兩倍以上。

伴隨着蘇聯經濟的高漲和實力的鞏固，蘇聯在歐美工人階級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羣衆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共產國際及其在全世界各國的支部的威信也日益增長，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也在增長中。所有這些，都鼓舞着中國人民的鬥爭，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艱苦奮鬥中感覺到自己的鬥爭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蘇聯和全世界強大的革命力量在支持着。

〔在國民黨新軍閥反革命專政下的國內政治經濟狀況〕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失敗以後，國內階級力量重新配置起來，不僅民族資產階級附和着買辦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而且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也離開了革命，繼續革命的只剩下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貧苦的都市小資產階級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以國民黨反動派為新的工具，代替北洋軍閥，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反革命的軍事專政——新軍閥統治。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是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建立起來的，因而它對外是投降帝國主義的。爲了欺騙人民，國民黨南京反動政府曾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虛偽口號爲幌子，帝國主義者也假惺惺地對南京反動政府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讓步（如放棄協定關稅），但實際上則是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着徹頭徹尾的投降外交，空前地出賣着民族利益。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黨反動政府曾向一九二七年三月砲擊南京、鎮壓中國革命的英美等帝國主義者表示歉意、賠償損失，並下令通緝在南京領導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共產黨員林伯渠，爲帝國主義『懲辦兇手』。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濟南，殺傷中國軍民一萬多人。蔣介石却無恥地下令國民黨軍隊不准抵抗，任憑日軍繳械，並下令保護日本人，說：『爲救一日人，雖殺十人亦可。』

從一九二八年開始，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侵略勢力顯著地增長。在對華的投資方面：一九一四年爲十六萬一千零三十萬美元，到一九三一年便增加到三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在對華的商品輸出方面：一九二七年中國入超爲九千四百三十一萬

海關兩，一九三一年便增加到五萬二千四百零一萬海關兩。由此可見，在國民黨賣國政府的統治下，中國不僅未脫離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在日益加深地趨向殖民地化。

以美、日、英爲首的各帝國主義者爭奪中國市場的角鬥，反映爲國民黨各派新軍閥之間的戰爭比以前更加頻繁地循環不息。

在各帝國主義支持下各派統治階級爭權奪利的鬥爭，首先使反革命的國民黨本身就分裂爲蔣介石的南京國民黨、汪精衛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以及廣東派等，互爭所謂國民黨黨統，同時爭奪地盤。一九二七年十月到次年一月有蔣李（宗仁）和汪唐（生智）的戰爭，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月間爆發了廣東軍閥和廣西軍閥間爭奪廣東的戰爭。一九二八年二月間，爲了爭奪華北，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形成蔣、桂、馮、閻四派的聯合，發動對張作霖的戰爭，北上攻打張作霖。日本帝國主義爲阻止英美勢力向北發展，助張出兵侵佔山東省會濟南，截斷津浦鐵路，並造成了五月三日的『濟南慘案』。蔣介石公開無恥地對日妥協，六月間國民黨軍乃佔領北京和天津。這時，美國爲了企圖和日本爭奪東北，策動張作霖的繼承者張學良和蔣介石合作，於是東北也承認了國民黨的統治。而蔣、桂、馮、閻的聯盟也就此結束了。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澤東在湘贛邊區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對當時軍閥戰爭形勢作如下分析：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

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爲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着明天的更大的戰爭。」（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一卷，第四九頁）

毛澤東的這個預言，不久便被證實了。一九二九年三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爲了爭奪華中的統治，結成反蔣聯盟，爆發了蔣桂戰爭。結果四月間桂系失敗，李白回桂盤據。十月、十二月有蔣對馮玉祥的戰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三〇年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聯合反蔣的戰爭；一九三〇年四月到十一月有蔣和閻馮的大規模的中原大戰。此外還有各小軍閥的混戰，如雲南的唐（繼堯）龍（雲）之戰，貴州的王（家烈）毛（光翔）之戰，四川的二劉（劉湘、劉文輝）之戰，山東的韓（復榘）劉（珍年）之戰。總計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三年間，國民黨新軍閥間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六、七次，戰禍遍於大半個中國，據估計約戰死五十萬人，並使無數老百姓遭受了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浩劫，這種殘暴情況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空前的。

這些戰爭都是蔣介石方面得到了勝利，其原因是由於他那一派挾持着僞中央政府的名義和國民黨中央的旗幟，取得了美英帝國主義更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財閥的支持。

經過這些戰爭，蔣介石國民黨的南京反動中央政權表面上統一了全國，實際上兩廣、四川、西北、東北各地方軍閥都保持半獨立的狀態，分裂割據，並繼續不斷地和南京反動政府發生公開對立以至戰爭。帝國主義就這樣一面扶植一個中央反動政權，作爲鎮壓革命和壓榨中國人民膏血的總工具，一面又採用分裂剝削政策，在各地扶植地方軍閥和這個中央反動政權相對立，製造中國的分裂和內戰，以便分而治之，控制中國。

這些軍閥戰爭，使各派軍閥相互削弱，客觀上有利於革命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削弱了白色政權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權得以乘時產生出來。』（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一卷，第五三頁）

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對內是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反動政權的階級實質和以前一樣，沒有變化，仍然是封建大地主和買辦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是統治的形式有了些變化，從舊式的北洋軍閥式的統治，改變成了新式的國民黨新軍閥式的統治。蔣介石國民黨篡竊了曾是革命旗幟的國民黨的牌子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牌子，作爲他們反革命的欺騙幌子，在『革命』詞句的掩蓋下，實行着比北洋軍閥更爲兇殘的法西斯統治。

在這個統治下，各階級人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比以前更加嚴重了。

國民黨反動派首先向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爭得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利益被剝奪了。在政治上，革命工會被封閉解散，革命分子被緝拿捕殺，據一九二九

年二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的報告，在豫、湘、鄂等省工廠，均有軍隊駐紮，工人稍有反抗，即遭武力壓迫。上海巡捕，隨時進廠捕人，進而加以共產黨的『罪名』，可以隨意槍斃或監禁。工人必須有保結和聯保。工廠裏還有特別的包探和反動工會的頭目，監視着工人。在經濟上，外資工廠固然是拚命的壓榨工人，受到外資壓迫的民族資本家爲了維持其高額利潤也更加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在一九二八年，上海各業工人的工資被大量地減少了，武漢工人的工資，能照所謂『共產時代』維持原狀的，只有十分之二，十分之八是減低了。廣州各業資本家都實行減低工資，建築工人的工資，由九毛半減至七毛，油業工人的工資被廠主減了三次。工資減少了，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却日益增加。工人的工作時間一般都恢復到十一小時以上，紡織廠工人由十二小時增至十六小時，一個工人由管理一、二部機器增到管理三、四部。勞動條件却越來越壞。在這樣慘重的剝削和壓迫下，工人的罷工鬥爭雖然不斷遭受反革命的殘酷鎮壓，但還是不斷地發生，如在一九二八年，僅上海一地，就發生了罷工事件一百四十起，參加的工人有二十三萬三千八百多人。

在蔣介石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之下，農村裏的豪紳地主向農民實行反攻、倒算。農民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建立起來的革命權力，被豪紳地主所摧毀，革命的農民協會被解散，農民領袖被捕殺，減租減息轉爲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紳手裏。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也越來越重。如江蘇省的田賦附加稅超過正稅的五倍乃至二十六倍。人民繳納的租稅，百

分之九十左右被用作戰費，連各種水利專款、賑濟款項也被挪用了。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農業生產日益萎縮，水災旱災跟着軍閥混戰的擴大而擴大，據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官方統計，一九二八年全國災區達二十三省，共一千零九十三縣又四市，災民的人數據極不完全的報告，已有五千六百六十二萬多人。一九二九年又增加到七千萬人。一九三一年天災更加嚴重，全國死於災荒者達三百七十萬人，根據國民黨賑務委員會公佈的數字，只江淮流域被淹死者就達二十六萬五千人。廣大農民幾乎被完全剝奪了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因此，不管蔣介石國民黨怎樣殘酷地鎮壓，廣大的農民羣衆仍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不斷地在各地舉行武裝起義。

在蔣介石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大批地失學失業，並且毫無民主權利；小商人和手工業者所負擔的捐稅是大大加重了。據記載，一九三一年在安徽、江蘇、湖北、浙江等省所徵收的營業稅，比一九二五年相當的各稅，超過三倍乃至十一倍。至於苛捐雜稅，則名目繁多無法計算，使得他們也一天天地走向破產。

由於在國民黨新軍閥的賣國統治下，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侵略的日益加深，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增加，嚴重地排擠和損害了中國的民族工業，例如，以當時中國最發達的紡織工業來說，在紗綫錠方面，一九二七年，華商佔全國紗綫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七，一九三一年便降為百分之五十五點七；在布機方面，一九二

八年華商佔全國布機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七，一九三一年便降爲百分之四十八點四，這就是說，紡織工業中的民族資本和在華外資比較，是日益處於不利的地位了。在帝國主義對華貿易中，所謂給予中國『關稅自主』改訂關稅的結果，實際上是更有利於帝國主義而更不利於中國民族工業。在新關稅制度的打擊下，上海的一百零六家絲廠，在一九二九年完全倒閉停業，其他各種民族工業如麪粉、捲煙、火柴、皮毛等也都逐漸陷入不易支持的苦境。民族資產階級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之下，並沒有得到政權，也沒有發展經濟的可能，所以他們在一九二八年就開始不滿起來，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着頗大的改良主義運動。

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本來在國內是依靠江浙的金融買辦勢力的支持而取得政權的。他們在得到政權後，便利其法西斯國家機器，殘酷地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開始逐漸地發展了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同時，也就逐漸地把自己發展成爲大地主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就成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中國歷史上最最後的最黑暗的專制反動勢力。毛澤東曾給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以最本質的分析，他寫道：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

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一卷，第四九頁）

「革命的低潮」 國民黨新軍閥的反革命軍事專政，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實行了極端殘酷的反革命恐怖。

在帝國主義幫助下，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這樣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無論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支反革命的軍隊。蔣介石國民黨，主要地依靠這支軍隊，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的人民進行瘋狂的屠殺，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的進攻，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至少屠殺了一百萬人以上，從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被殺的工人和農民至少有十萬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華大學等十一校救亡通電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四月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無數的民族精華——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在這時期英勇地流血犧牲了。

在這種極端恐怖的反革命屠殺下，革命的主觀力量是大大地被削弱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有組織的工人，始終只有七萬人左右。城市工人運動的高潮暫時過去了，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工人階級的鬥爭，由進攻的性質轉到防禦的性質。工人罷工的事件，在白色恐怖的摧殘下也被迫逐年減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大量減少，只剩下一萬人左右了。在農村中，毛澤東曾根據革命失敗之後在井岡山進行游擊戰爭的經驗，正確地指出

革命潮流的低落的情況。他說：『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羣衆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一卷，第八〇頁）冷冷清清，就是說羣衆運動被打散了，尚未恢復過來；要硬打，就是說反動階級的統治尚未臨到崩潰的危機，尚未發展到完全不能統治下去的局勢。上述的情況，也就是一九二八年二月斯大林所說的：『廣大的工農革命運動的第一個浪潮（基本上是在共產黨的口號之下——並且大半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已經過去了。這個浪潮，在革命運動的許多中心，是以工農受着極嚴重的失敗，工農運動的一部分共產主義幹部及一般革命幹部之肉體消滅……而告終的……現在還沒有全國範圍的新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強有力的高潮。』（見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但是，革命的高潮是一定要到來的，因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不僅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更爲嚴重，中國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民以及其他革命的人民，都仍然迫切地需要變更現狀的革命。正如一九二八年二月斯大林所說的：『中國的革命，『不論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土地革命及封建關係之消滅），或從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鬥爭的觀點來看（中國之統一及民族獨立）……都沒有完成』（同上）。

毛澤東也指出，中國仍然迫切地需要繼續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中國徹底的民